

从批评的“失语”到“重写文明史”：曹顺庆访谈录

From the Critical “Aphasia” to “the Rewriting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Cao Shunqing

李伟昉（Li Weifang） 曹顺庆（Cao Shunqing）

内容摘要：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学术界处在“失语”的病态当中，只有发掘自己的民族话语，树立文化自信，建立中国学派，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特色和可用的方法，与西方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在进行跨文化研究中，我们要重视“同”的追求，但更要强调“异”的挖掘，变异学的提出和实际操作意义重大。目前，中国学派已经有自己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但若想拥有完整的话语体系，就必须重塑新时代的文明观。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和重写文明史的倡议，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服务于人类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失语；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变异学；重写文明史；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伟昉，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研究；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国批博士生导师（1993），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5）、国家级教学名师（2008）、教育部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首席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比较文学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多个项目，多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及四川省政府社科奖等奖项，担任 CSSCI 集刊《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published by Routledge）主编。

Title: From the Critical “Aphasia” to “the Rewriting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Cao Shunqing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Chinese scholars have realized that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suffers from aphasia and that its equal dialogue with the West will be impossible unless we explore Chinese national discourse, establish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orm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vailable method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pursuit of “similarity,”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the excavation of “difference.” Therefore, the proposal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Variation Theor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Despit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School, it is necessary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f we aspire to establish our own complete discourse system.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proposal of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re all aimed at better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bett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ankind.

Keywords: aphasia;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ariation Theory; rewriting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uthors: **Li Weifang**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iweifanghd@126.com). **Cao Shunqing** is Outstanding Professor of Sic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the Ex-presid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cademician of the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Doctoral Supervisor (since 1993), Academic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hang Jiang Scholars 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5), winner of National Teaching Master Award (in 2008), the Chief Expert of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textbook for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ad of the National Elaborate Course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ad of numerous projects such as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nd tha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nner of many awards such as the Nation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Teaching Achievement,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war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 Award of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Editor-in-chief of CSSCI-source journal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 (Email: shunqingcao@163.com).

李伟昉（下文统称为李）：曹老师好，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很早就期待能就一些疑惑向您请教，就一些想法和您交流。

曹顺庆（下文统称为曹）：伟昉教授好，很高兴和你一起探讨学问，交流思想。

李：我印象中读的您的第一本书是《中西比较诗学》，应该是在1990年初，时间匆匆，太匆匆，转眼间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杨明照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至今尚未得到世界（特别是西方）的认识和承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所知甚少，而且还无端地加以轻视。¹作为研究《文心雕龙》的泰斗级大师，为中国古代文论鼓与呼有其正当性，毕竟其对于中国文论的当代处境有更切身的感受。您是否也受到杨先生学术观点的影响，有一种被蔑视的不快，您的很多观点是否有不平而鸣的意味？

曹：我在1996年的论文“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开宗明义：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²我所说的文论失语症主要针对世界、甚至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内完全没有中国文论的声音或者中国文论在发挥效能的现象。我将之称为文化病态。

李：我记得您还对这种病态产生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的结果。这种文化病态使得人们的民族心态失衡，常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甚至导致偏激性格的形成。如同语言不使用即会忘记一样，这种病态还造成了学人与传统批评话语的疏离乃至隔膜，中国学人搞不懂自己的批评传统了。与之相关、也最可怕的是，中国学者文化价值观念开始变得扭曲，西方的理论与西方文化成为了唯一的乃至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和尺度。

曹：是的，你概括的大体是精准的，我当时是这样描述的，遗憾的是，这个略带预言性质的判断在近三十年几成事实。

李：这让我想到您在文中提及的对上世纪80年代摹仿西方文论的描述和感慨。这些对现代派文论的摹仿是“伪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思潮和大量的当代文论令文坛目不暇接，令文人消化不良。您还提出要重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要汲取东西方文论养分来浇灌自己的花园，培育中国文论的参天大树。其实，从您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您对80年代学界的某些做法并不是特别满意，遗憾、心有不甘是否也算您对这个特殊时段的情愫表达。

曹：我大体明白你的意思。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作为一个概念消逝三十年的时候。三十年在中国人的时空描述中很重要，“现代文学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从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出版的专著来看，它确实带领我们重温了过往，似乎回到了

1 参见曹顺庆：“序”，《中西比较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 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2（1996）：50-58。

历史现场，但是，不少论述其实也是对自己青春不再的感伤，对岁月匆匆的喟叹，对抓不住现实的一丝惆怅。对过往历史，要记述，但更要有基于当下和未来的反思。换句话说，80年代，人们的精力与核心关注都放在了对西学的介绍和引进，疏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思与精研。

李：这是您对80年代的反思和检讨，是实事求是的学术视角。我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即1995年，您还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该文首次对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特征及其基本方法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理论阐述，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代表性理论文献，对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¹ 重温此文，对于我们当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与国际传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启示。

曹：谢谢你的这个定位和评价。这篇文章在发表后的二十多年经受了学人的诘问、同道的关注、乃至时间的洗礼，也为“中国学派”问题的提出和讨论贡献了思路。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中国学派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并形成了五大基本方法，即“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法”和“建构法”。这五大基本方法彼此联系，相互支撑，统一在“跨文化研究”的特征下发挥作用。

“阐发法”虽然最先由中国台湾学者提出，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早已出现在诸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之中，在中国比较文学中确实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中国台湾学者的阐发是要用西方的文论来解读中国的作品，这是一种单向阐发。所以，大陆学者提出了“双向阐发”。确实，“阐发法”是在中西文化发展不平衡，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着眼于西方文论，在相对被动的文化境遇中引进外国文论以阐发本国文学作品的一种结果，一种策略和方法。这样做有其时代性和必要性，是中国人谦逊、低调美德的体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批评传统，所以用中国文论来阐释国外的文学，同样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广而言之，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论来阐释他国的作品，都是具有合法性的。用印度的文论来阐释日本的作品，用苏格兰的文论来阐释德国的文学，我们都不反对，只要阐发得体，说得高妙。我们不但不反对，还要给予肯定和赞扬。

“异同比较法”的重要特征是立足于中国文学，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将中国文学通过比较的方法推向世界。它在跨文化异同比较、辨析中更关注“异”。强调差异不仅是为了沟通，也是为了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这其实也是我在《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观点：相同之处愈多，亲合力愈强；相异之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重大。就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而言，都可以把自

1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1995）：18-40。

己的核心经典或者文学作品与世界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找出差别，看清自己。

“寻根法”强调对不同文学背后文化差异的深层根源的考察，以避免浅层次的简单比附。寻根的意义在于找到表面相类相似的潜在原因，进而厘定外在关联的真正本质。这样既有利于重温自己的传统，也便于纠正人们的偏见或者误解，从而从更深的层面理解研究对象。

“对话法”更为注重平等沟通。以前我认为，首先要努力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而又都能理解的话语。这种话语既非西方话语，亦非任何本土的话语。但我现在觉得这样可能不太现实。语言比如英语或者汉语，本身未必有意识形态性，语词有倾向性，但更重要的在于运用语言的人，在于学者改变思维方式，矫正错误态度，放下自我中心主义。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可以选择问题切入，以问题为导向来进行对话，比如男女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与秩序的关系、政制建构与理想人格的培育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可以各抒己见、各显其能，进而对话交流的。

“建构法”旨在通过前面四种方式的实践之后，能够在比较诗学、经典遴选、问题探讨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绩，可以在批评方法、世界文学标准、文学与社会互动关系、文学与道德风范等方面探究出能令各方满意的方案来。它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参与讨论的各领域知识人学识的融通。新建构起的内容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而属于全人类，属于这个时代。

“世界文学”是近几年国内学界讨论比较多的话题。这里不妨说一点个人想法。鲁迅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在有人提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语言单从字面来理解，往往容易造成误解。我相信鲁迅先生的意思也绝非坚守民族的而拒斥世界的。在和世界其他文化、文明对话时，我们确实需要坚持自己的特质，特别是对有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充盈向上、有利于民众追求高尚道德情操、有利于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制度、文化、礼法等，我们一定要坚守。但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上好的。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所坚守的东西是在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维护私欲；某些冠冕堂皇的所谓共同规则，实际上是自私的，甚至是残忍的、邪恶的。有个性的，未必就一定好的。有追求、上进的民族一定会以他者为镜，省视自我，并勇于放弃自身的不足，倡导和谐相处。换句话说，一些民族文化典籍，未必一定具有普遍性。只有作品中的经验、智慧、形上思考超越了其产生的语境，翻译流传到了别的族群还是宝贵的、适用的，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人类的共同的财富。世界文学自然来自于各个民族的文学，但它必须是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是美的和善的、关注个体感受的、注重人类长远利益的、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文学才能超越民族，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学”。

李：通过您的讲解，我更加理解该文的立意和旨归，也对世界文学问题

有了更深的认知。这篇文章是在归纳中国比较文学很多研究实绩、融汇了中外学者基本共识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学派”的宣言书。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需要清晰阐明其自身的理论特征，还需要从根本上界定其区别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不同之处。我想进一步了解的是，“跨文化研究”为什么被认为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呢？

曹：这个问题很好，也有很多人问到过。跨文化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乃是因为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都同属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树所生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圈，它们之间没有面临跨越巨大文化差异的挑战，也从未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美国学者威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甚至反对不同文明的文学比较，认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因此，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化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化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在这一状况下，中国比较文学的使命就突出体现在“跨越”和“沟通”上。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的第一堵墙，建立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跨越了学科界线的第二堵墙，沟通了无事实联系国家间的平行关系，那么中国则面临着第三堵墙，即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总之，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都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的具体化或延伸。这些观点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做了阐发，特别是对“异质”和“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强调，这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弥补与超越。

李：我注意到，您曾撰文把中国比较文学倡导的“跨越异质文化”的研究视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区别于法国学派推崇“影响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的第二阶段。

曹：是的，在2001年，我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不仅对中国学派的特征作了进一步阐发，而且明确把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中国比较文学阶段正式命名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提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不是对此前学科理论的否定，而是在其理论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和延伸。这个阶段不同于此前“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个阶段的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东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前两个阶段都忽略了或有意遮蔽了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因而形成了长时期的东西方文化和文论的隔膜，造成了东方文论异质性的丧失，比较文学研究无法真正具有世界性。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代表的第三个阶段，可以使比较文学研

究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人为制造的一个个圈子中超脱出来，使之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眼光与胸怀的学术研究。为消除歧义和误解，进一步强调“跨文化”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我把“跨文化研究”又调整命名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¹

李：细细想来，“跨文化研究”的提出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主张都是质的飞跃。法国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基于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都还属于欧美文化圈，而跨文化研究的提出使得中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具有更强的适用性，甚至是比美国学派更具适用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的名称，虽然都有着理论家所在国的地域标识，但它们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²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族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与之相应，矛盾和冲突也更常见乃至普遍。当然，文化差异是纠纷、齟齬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跨文化研究既是对既往文化交流事实的本质性、背景性揭示，也是对将要开展的对话、交往的一种理论预设与先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同一文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求同”，而在相异的文化语境中，比较文学要更加强调“存异”。

曹：这种概括有其不精准的地方，但往往能揭示一些关键性内容。就重视差异而言，中国学派特别重视文学交流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现象，我进而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研究”。

李：这几年，变异学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国外也有不少讨论，请曹老师略加阐述。

曹：我当时提出“文学变异学”是注意到下列现象：第一，从人类文学史的历时发展形态上来看，不同文学体系在横向交流和碰撞中产生了文学新质，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比如魏晋以来的佛教文学进入中土，中国文学在这种横向冲击下，吸收借鉴从而产生了新的文学变异现象。第二，在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大量针对同一文学现象而形成的不同文学表达形式乃至观念的变异。第三，在对比较文学中的审美批评进行考察时发现，文学现象之间的发生影响伴随着审美性因素和心理因素，艺术和美学上的变异时有发生。理论因现实问题而生发，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并给予合理的解释，是我提出“文学变异学”的根本原因。

针对这些现象，我认为“文学变异学”起码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进行研究：首先是语言层面的变异学研究。这个主要指的是伴随着翻译在不同语

1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3（2001）：3-19。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境中的发生而产生的语义的变异。当下的翻译研究已经不属于基于实证的媒介学研究，而是推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处境化。在这种情况下，考察语词乃至文本的变异也就成为必要。其次是形象学研究。形象学研究一国文学作品在表现他者形象时，因为社会“集体想象”而产生的形象异变。最后是主题及文类变异以及文学误读现象的考察。主题学研究近三十年被人们略微忽视了。一个文本能最终经历时间的淬炼而成为经典，靠的还是它的主题。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老友孟昭毅教授新近出版的《比较文学主题学》，洋洋洒洒四十万言，体大思精，意味深长，是主题学研究的力作。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还存在文类转变的现象，在英国是戏剧，到了美国成了小说；在法国是叙事长诗，到了东方成了戏剧文本；在欧美是悲剧，到中国成了喜剧。这些跨越文类的变异非常值得研究。文学误读现象同样值得深入考察。误读可能是有意的误读，原因可以有很多，也可能是无意的误读。当然了，既然说到误读，意味着存在正读、正解。在这点上，我更加倾向于经典阐释学的立场。今天的读者多强调“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但我更看重独一无二的莎士比亚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所以，既要重视、解析误读作为正常的乃至必然发生的文艺现象，也要辨析文本的真正面相，对经典进行溯源。

李：谢谢曹老师的阐述。听了您的解析，我有一个未必准确的感觉，似乎您特别重视差异的存在。

曹：你的感觉是对的，我近年确实比较重视这个问题。认识到差别、差异是主体确立的必需、必要的步骤。但是，重视差异并不等于忽视相同性，强调共同、共通的东西，同样有其必要性，但需要注意一个现象或者事实，强调同的一方往往是比较中的弱者，或者较为弱势的一方，求同是一种沟通和交流的美好愿望。在求同的过程中，较为强势的文化往往会遮掩乃至最终消除掉弱势一方。所以找到差异是主体性确立不可或缺的工作。认识到差异，才可能有对话。甚至可以说，认识不到差异，求同也不可能很好地达到。

李：您的这个说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深入思考。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您提出要进行“跨文明研究”，从文化到文明，一词之差，但差别却是非常明显的。

曹：文化与文明是不同的概念，文化可以有很多种，甚至可以延伸出餐饮文化、民间文化、赛艇（龙舟）文化等，而文明虽也是复数，但数量却少得多。文化是文明的表现形态，文明是文化的根茎、源泉、精魂。

李：您这样的概括比为文化、文明下一个定义更好理解。我能明显感觉到，您将跨文化研究推进到了跨文明研究，您甚至提出“重写文明史”的主

张和倡议。我静心想想，发现“文明”其实一直是您念兹在兹的东西。

曹：我必须说，你是特别能看懂我、理解我的人。守护中国文学、中国文论，树立文化自信，乃至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其本义从深层次讲都可以视作是在守护我们的文明。从近处说的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失语，与对文明史的认知缺憾有直接关系。文明史的书写不仅仅涉及不同文明观的交融和呈现，更关乎历史史实的裁定，进而关乎“文明自信”，这是人文社会的本质性根本性问题。

李：没料想您对“重写文明史”有这样高的定位和价值判断。据我所知，写文明史其实已经不是新事物了。

曹：你说得没错，文明史书写的历史的确已经有年头了，而且成绩斐然，大部头的著作也能列出一长串来。但问题是多年来文明史撰写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上，一些文明史本身存在严重的文明偏见、文明遮蔽、文明歪曲等问题，必须以事实来纠正。我更宏远的期待是将重写文明史视作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路径和举措。我的想“重写文明史”的目的不在于短期内建构起代表中国立场的“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史”，而是检讨已有文明史著中关于文明定义和文明观中存在的问题，以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为目标，邀请全世界学者共同参与，通过中外理论家的不断“对话”，实现关于“文明观”问题的新的共识。联合志同道合的国际学界友人，以客观、公正的视角重写文明史，并以文明史统摄、带动不同学科的自我反思和话语重建，以文明史镜鉴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以文明话语体系推动世界范围内国族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服务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李：您的抱负让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您的想法既有时代感、使命感，富有担当意识。我能感受到您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和关切。但很显然，我们的想法未必能得到西方学者的响应和支持，据我所知，当前存在的“文明史”没有一部符合您上面提到的要求。而且，汉语学界这几年提到的共同体概念，在西方认知中，本身就包含着“朋友”的意思，当以“敌友”来划分、看待世界时，他们不认为与我们同属一个共同体。

曹：我认同你对西方文明史书写现状的判断。这个我下面会论述到，但是，你所提到的共同体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西方思维，你将西方对共同体的解释当作了行动的标准。要知道，我们不是在同“西方”打交道，而是同西方大学里面的教授，尤其是同开明的、友好的、有远见的教授一起做事。他们本身对自身的问题有着省查，对西方的缺陷有着认知，对和我们合作有着期待。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你提到的西方文明史著述，除去国别文明史、区域文明史、以及文明史

研究方面的、可以算作整体性文明史著作的，大概有七十部左右。所谓“整体性”，指的是能够站在人类整体文明发展历程的高度，能够宏观梳理、勾勒、叙述人类文明。

李：七十部，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曹：是啊，这本身很能说明问题。西方学界对把握世界、书写世界的欲求何其强烈，而我们似乎在这方面缺乏远见，以及相应的、有影响的标志性成果。这或许也是我倡导重写文明史的原因吧。

李：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西方文明史写作的状况。

曹：最先写就文明史著作的是美国学者。爱荷华大学校长阿莫斯·迪恩（Amos Dean）在1868年推出了七卷本的《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在1874年，美国学者威廉·斯文顿（William Swinton）出版了《世界历史纲要：古代、中古、近现代、与文明史和人类进步相关》（*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这两部书有很大的学术贡献，在文明史的研究上有开创之功，但在对东方的描述上却充满偏见。前者认为亚洲文明停滞不前，甚至一无是处。既没有明显的精神或者道德进步，也没有科学或者艺术上的重大发现。¹后者则对中国文明只字未提。对这样的文明史著作，我们自然不会认同。

进入20世纪后的几部著作值得重视，历史学家赫伯特·维尔斯（Herbert Wells）在1920年出版了《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1935年推出了《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很明显，这两位都开始重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但书中所用篇幅非常有限。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史实的叙述有太多错误，对中国文明、历史的介绍更是残缺不全、支离破碎。20世纪后半叶值得推介的是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以及皮特·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在1992年出版的《世界文明：全球经验》（*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两套书均有长处，但作者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民族优越感无处不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解读、分析中国作品，不能正视历史真相之处俯拾皆是。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著作有两部值得一提：马吉德·特拉尼安（Majid Tehranian）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于2000年出版了《对话：关于全球文明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A Dialogue*），马吉德在2007年还出版了《重新思考文明：解决人类家庭的冲突》（*Rethinking*

1 参见 杨清：“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四川大学学报》1（2023）：27。

Civilization: Resolving Conflict in the Human family)。前者从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和对话谈起,强调对话在解决文明冲突中的作用。后者则借助“全球”“人类”“世界”“文明”等语词来思考人类文明未来走向,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应该说,这些标志性著作在各自的时代代表着时人对文明史的看法,总体而言,人们对文明史的看法日渐走向完整、客观、深入,但其距离我们前面提到的“文明史”还有不小的距离。

李:据我所知,这些书有的卖得相当好,有些甚至已经出到第三版,并多次印刷。

曹:我怎么听出了销量决定论、市场决定论的弦外之音呢。卖得好不代表书的质量一定好,当下图书的畅销和营销关系太过紧密。这在一定程度上遮掩或者说混淆了图书的品性。学者的评价要用学术的眼光,有学术的观点。

李:愿闻其详。

曹: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史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发表了“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提出的将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冲突的观点遭受了广泛批评。他随后发表了“不是文明是什么”的文章,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¹以后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Order*)一书,更是火爆异常,一版再版,但文明观却大有问题。同一时期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最终胜利。

不难发现,美国人热衷于写文明史。但遗憾的是,这个叙事有很大的问题,粗略而言,可简单概括如下:1、对源头的叙述与事实不符。比如说西方文明的源头问题,西方文明源于二希传统,这几乎被所有学者当作常识。但事实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都受到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字并非独创,而是学习菲尼基文字而来,菲尼基文字则是学习苏美尔楔形文字而产生的,后者比前者更早更古老。2、对非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无视。多数文明史只是欧美史,它们对古老的非洲文明、中国文明,往往只字不提,或者仅有只言片语,而阿拉伯文明自身的辉煌、其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直接作用更被避而不谈。3、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产物。但当下的文明史忽略了这一点,多将各个文明视作静止

¹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页。

的、孤立的存在，看不到外来文明对区域内文明的刺激和促进作用。亨廷顿甚至宣称：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者根本不存在。¹⁴多数研究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者种族优越感，他们往往从虚幻的当下的实力、地位出发，去看待自己的文明，认为自己的国族当下是发达的，所以祖上亦必然是辉煌灿烂的。这是对文明以及文明史的极大误解。

李：听了您的精辟总结，感觉每一个说法都很有道理。那么，除微观知识上的准确，在宏观上，您主张文明史应该如何书写呢？

曹：你的这个问题恰是我近年一直在思考的，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文明史应是由多国学者共同写就。文明的传承者对自己的文明往往有更深的感情和体验，除非某种文明已经消亡，没有了传承者，否则应尽可能由文明的担纲者来书写自己的文明。文明史书写是人类文明的大事，甚至是当下最大、最紧迫的事情，值得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应该邀请国内外对思想史、文明史确有研究，对文明史研究有关切、有情怀的学者来参与，若实难协调，我们应充分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由他们出面统筹安排。

其次，文明史书写不能基于书写，更要重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文明史书写大体来说不够严肃，很多人将书写当成文学创作，看作是浪漫叙事乃至艺术创造，这是对文明史的最大误解。文明史的写作应该是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科学的文明考古。它的文字应是信实的而不是虚构的。

第三，我们应该加强对基础典籍的发现和考古。文明最终沉淀在器物、体现在文字并被编纂为典籍。借助文明史书写，我们要重启各个文明的对话，国际间也要在开诚布公的前提下展开对话和论争，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和辩读，彼此间甚至应该允许互相辩难，直至达成共识。尽管前路漫漫，但在光明的召唤之下，勇士是不能怕走夜路的。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为此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能量。正如伏尔泰所说：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中国史学传统讲求良史“书法不隐”“文直事核”，重视“史德”“史学”“史才”，追求“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境界，这些都是上好的规范和道德遵循。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兼济天下的大情怀，这对于文明史书写不可或缺。

李：谢谢曹老师分享自己的思考，您对中国学术前途、人类未来命运思考得殚精竭虑，让我感佩至深。对现实的关切让您有了鲜明的、强烈的问

1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题意识，问题意识始终引导着您去思考、去探寻，也让您一直处在不断追问的前沿，接连催生出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您与其他学者一起引领学界走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并对话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您的这种执着精神、大格局胸怀一定会启发更多的后学在广袤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我们期待您永葆学术青春，再创新的辉煌。

曹：谢谢你，这对我是鼓励，也是鞭策。当然了，我上面的论述多是宏观的，皆有可以提升、充实、修正的空间，期待方家批评指正。再次感谢伟昉教授的采访，我们一同前行。

Works Cited

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1995）：18-40。

[Cao Shunqing. “Bas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 (1995): 18-40.]

——：《中西比较诗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Comparative Poe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0.]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2（1996）：50-58。

[—, “Literary Aphasia and Cultural Pathology.” *Literary Debate Magazine* 2 (1996): 50-58.]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3（2001）：3-19。

[—, “Thre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2001): 3-1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Order*, translated by Zhou Qi et al.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Centr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杨清：“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3）：24-33+187-188。

[Yang Q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Compilation Review.”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2023): 24-33+187-188.]